



《蛙》
莫言/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年12月版
定价:27.00元

书山觅径

莫言 vs 张锐然 天生胆小怕事

2009年12月底的一天，莫言和张锐然做客网易读书频道“网易阅读客厅”，来了一次对谈。坐在莫言熟悉的茶馆里，他们聊起了莫言的新作《蛙》，说到两代人对于计划生育、对于那个年代的记忆……

作为计划生育后的一代，张锐然则觉得很少有小说像《蛙》这样“把作者的声音表达得如此清晰、明确”。为了与莫言对话，她认真地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准备了很多问题。但是她一来，却先拿出了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打开了莫言的星盘……

进入到当下时代，我觉得用那种笔法无法表现现实。当下这个时代就是充满了黑色幽默、充满了反讽现象的复杂、立体的社会。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尽管社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但人别的方面还是比较正常的。现在这个社会，尽管自由了、开放了，但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稀奇古怪、荒诞的现象，比那个时代多得多。

上帝恩赐了礼物的人

张锐然：是这样的，您的星盘属于算命的人看到都很开心，要付您钱。因为看了您的盘，让我长了见识。

莫言：是写小说虚构吧？

张锐然：不是，真的是这样。（打开星盘图）这是一个信封，是一个打开的信封，意思是上帝给了你才华，给了你礼物，把它装在了信封里。你把它从信封里拿出来。这样的人是上帝赐予了礼物的，一种恩赐。

从性格方面来说，特别均衡，有些人集中在一个地方，你的比较分散，很多面。您不是那种天质癫狂型的作家，还是很均衡的。

莫言：有一种最后的底线，不至于疯了。

张锐然：这上面还反映了，您在家里挺孤独的，无论是早年的家庭生活还是（以后），自己的时间比较多。

总之，这上面有很多因素，最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一个漂亮的格局。这个格局让我们觉得很均衡。有格局就会很紧绷，不容易散架。

莫言：有一种相对均衡的结构。

张锐然：我跟您开了很多次的会，包括您去韩国，感觉您很多时候都会委屈自己、迁就别人，别人说怎么怎么样，您就不好意思拒绝，说那就去吧。我觉得作家还是有比较自我、比较任性的一面，有时候我觉得这对写作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会比较集中。从对您性格的了解，包括看您为人处事的方式，我觉得挺累的。

莫言：是挺累的，没办法。

影片介绍

黄家正是一位年仅17岁的音乐天才，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家境富裕，让他在物质生活上不虞匮乏。11岁那一年他赢得香港校际音乐节钢琴组大奖，也获得去捷克和当地专业乐团合作演出以及录制贝多芬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机会。对于这样的人生他却开始产生疑问，“为什么要演奏音乐？”和“人生就只有音乐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他小小的大脑中层出不穷。

今年他17岁了，就实际音乐成绩而言，例如奖项以及演出机会，他没有太大进展，其中有两年他更停止了钢琴演奏。他有时不快乐……这不单单就一个功利层面而言，黄家正所思考的不止于此。

这部纪录片是关于一个人的内心：他的思考、他的挣扎、他的选择，表面是一个天才的故事，但其实是每一个人的故事，因为所谓怀才不遇、发挥天赋等，不正是生活中每天都在感叹和盘算的事吗？

导演介绍

张经纬，香港出生，祖籍广东深圳湖贝村。年轻时，学习大提琴；之后，到美国的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修读音乐硕士课程，因此有机会接触很多其它科目，最后主修电影制作，副修哲学毕业。曾制作4部剧情短片及监制1部纪录短片，作品在多个国际影展中参展及获奖。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剧本《上帝的苹果》获得2001年中港台电影神话剧本创作赛优异奖，而第二个剧本《天水围》亦获得2005年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的最佳故事奖，此剧本由许鞍华导演，2007年入选CNEX第一届主题征案，完成纪录长片《歌舞升平》，并以此片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韩国首尔独立电影节非竞赛单元，第20届法国飞帕国际电视节等。

导演手记

我以前学大提琴，梦想做马友友，傻傻的苦练到26岁时，认识了一个拉小提

琴的日本女孩，很快就和她结婚，从她身上我明白到什么叫“才能”……所以，算了，不拉琴了。在大学东摸摸西碰碰，结果搞上了电影。

2002年我第一次和黄家正见面，他当时11岁和捷克的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我就是喜欢听他弹，很迷人，一直听，听到他现在已经17岁。我羡慕他，他是天才。

但他有时候不太快乐。

万般皆苦，做人难；活在芸芸众生中，社会中做一个鹤立鸡群的天才……更是难上难。

苏东坡感叹曰“人皆生子望聪明”，可是，谁又不想如三国演义中曹操所说的龙一样“兴云吐雾，飞腾于宇宙之间”呢？

人，所有的人，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就在这矛盾中拉拉扯扯，找寻我们的梦想和希望。

《音乐人生》



导演：张经纬
主演：黄家正
语言：英语/粤语
制片国家/地区：香港
上映日期：2009年
又名：Music and Life/KJ

苍白的“灵魂之痛”

文/陆嘉宁

多年前读莫言的《檀香刑》便曾叹服于他悲悯的情怀和诡异妖娆的语言，如今听说又推出了新作，便去找来一看。

《蛙》仍然以山东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将视点聚焦于在乡村诊所当医生的姑姑。姑姑是革命者的后代，是一块真正的“红色木头”，她几十年间穿梭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从事着最基层的工作：从为东北乡的村妇们接生到强制不听话的刁民们打胎、做节育手术，姑姑的手上散发着奶香也沾满了鲜血。在村人们眼中，姑姑的形象是尴尬而令人难堪的。然而，无论是令人安心的“送子观音”还是遭人厌恶的“胎儿杀手”，姑姑始终坦然面对生命的起伏，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国家造福。

在《蛙》中，青蛙是个有趣的意象，姑姑晚年曾极度恐惧青蛙，那皮肤黏稠、光溜溜的青蛙正像孕育在子宫中的胎儿，莫言显然仍渴望在魔幻和现实之间寻求一种嫁接术。然而这个在文中反复出现的隐喻，却显得多少有点生硬和不自然，倘若不是作者刻意强调，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将“蛙”与“娃”联系到一起，将人类的创生神话和一个乡村医生的恐惧相提并论。

莫言坦言：之所以要塑造姑姑这样一个尴尬和令人质疑的形象，是因为他要叙写中国人的“灵魂之痛”，要呈现“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与今天大多数风花雪月或自我娱乐的作品相比，《蛙》在直面现实的过程中的确显得勇气可嘉。然而，莫言的写作究竟有没有触及真正所谓的中国人灵魂里的痛楚呢？窃以为不然。

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言：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在结构上面，《蛙》的布局显得意味深长，全书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组成。由同一个主人公“我”将有点松散的结构串联在一起。光从这点上，便可看出莫言对小说形式之道的谙熟和探索新写法的良苦用心。然而形式上的花哨并未真正服务于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偏离了传统讲故事的手法，莫言偏偏将叙述者的视角摊派给一个大部分时间处于旁观者地位的人物。在叙述中，文字既没有直指姑姑苍凉复杂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剖白村民们对多子多福之企盼的传统文化心理，在貌似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不动声色地叙述，使小说显出无力感。

在《檀香刑》中，文字似探针般深入主人公的心脏，使得人物心灵的隐秘有效地同步传达给了读者，而在小说《蛙》中，对姑姑的叙述从头至尾站在“我”的视角，虽显得客观明晰，却缺少了震撼人心的生命感觉。于是，我们看到，在《檀香刑》中那种荡涤文字的振聋发聩的对生命的困惑不见了，那种无力在浑浊的世事中界定黑白、探索是非，却又不甘心随波逐流的孤独感，在一片蛙声中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唯有无关痛痒的人生，和苍白肤浅的“灵魂之痛”。

（来源：《上海一周》）

戏谑的描写，开业那天挂了那么大标语，做了那么多宣传，这是一种反讽。本来乳房是哺乳功能，但到了1980年代之后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种审美，变成了一种暧昧的意象，甚至它最原始、最本质的功能都被排除在外了。

张锐然：也就是您对乳房的意象还停留在一种……（饥饿阶段？）

莫言：之前我想把它当做一个神圣的东西来描写，但到1980年代之后我觉得被这个商业化、欲望横流的社会歪曲成一种性的象征了。《丰乳肥臀》这个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反讽的意味在里面，尤其到了后半部，有人说前面是现实主义的写法，为什么到后面变得那么夸张、魔幻？

张锐然：其实和《蛙》还是有点像，到了《蛙》的第四章中代孕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变化，有一种荒诞的感觉。

莫言：小说《蛙》的前3部分是非常老式的，是用比较现实主义的笔调来写的，到了第四部分一下进入了当下。进入到当下时代，我觉得用那种笔法无法表现现实。当下这个时代就是充满了黑色幽默、充满了反讽现象的复杂、立体的社会。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尽管社会的政治

生活不正常，但人别的方面还是比较正常的。现在这个社会，尽管自由了、开放了，但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稀奇古怪、荒诞的现象，比那个时代多得多。

度可能是针对外界的，更多的是针对自我的。尽量地减少重复，是一个最大的课题。

张锐然：会看之前的小说吗？

莫言：还是会回忆一下吧，翻一下过去我写过什么东西，然后再考虑写这部电影。我觉得有几个点，首先想一下这部电影里到底想表现什么，有哪些想法，我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有没有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假如有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很好的契机。

另外要看故事，我想故事都是一样的，差不多，（看）我要写故事的哪一个侧面。

最重要的还是要讲人物这个问题，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写出来的人物是不是和我过去小说系列里所有的人物都不一样——不能说完全不一样，起码要有不一样的地方。假如这个人物在我过去的小说系列里没有出现过，或者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在别人的小说里也没有出现过，我就可以确定这部小说应该是有价值的。再大的作家，最终让人记住的都是人物，有人物才能带出事件，而不是哪一个历史事实。（来源：《上海一周》）